

分化与整合: 加速转型期中国社会稳定性分析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An Analysis on the Stability of China's Society in a Fast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文 军 朱士群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南京 210093)

一、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加速转型期

“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一词来源于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和现代化理论。“转型”是社会学家对生物学概念的借用。在生物学中,transformation为生物演化论,是指“微生物细胞之间以‘裸露的’脱氧核糖核酸的形式转移遗传物质的过程”,特指一物种变为另一物种。^[1]西方社会学家借用此概念来描述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变。如在当代颇具影响的D·哈利生撰写的《现代化与发展社会学》一书中,其在论述现代化和社会发展时,就多次运用社会转型一词。^[2]台湾社会学家蔡明哲在他的《社会发展理论——人性与乡村发展取向》一书中则首次直接把“social 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转型”,并表达了“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过程的思想。^[3]

当前,“社会转型”已成为社会科学界普遍使用的一个热门术语,其基本内涵就是指社会的整体性变动。但在社会学中,社会转型主要是指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根本性变迁,它不是指社会某个领域的变化,更不是指社会某项制度的变化,而是指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整体性变迁。其具体内容至少应该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而且这种转型的实现往往不是通过暴力的强制手段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主要是通过发展生产力和确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来完成的。但在中国绝大多数学术论述中,“社会转型”期常被用来指社会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过渡的时期,是社会中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尤其是特指对当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时期。^[4]很显然,这只是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转型的,其产生的语义背景正是当代现代化的生动历史实践。^[5]

实际上,即使是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社会转型期,其从1840年开始启动现代化进程、实现传统社会开始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至今也有160年的历史了,期间大致经历了3个不同的阶段:1840~1949年为第一个阶段;1949~1978年为第二个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三个阶段。所不同的是,在

不同的转型阶段,其转型的速度、强度、广度、向度都有所不同。如果仅从速度来看,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加速转型的过程中,因为西方早期现代化国家一二百年走完的现代化之路,我们将在以后几十年内完成,没有一定的速度不行。从我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来看,在第三个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的20多年的发展,已超过以前140年的总和。^[6]毫无疑问,其发展速度也是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因此,我们不妨把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称为加速转型期。^[7]

在这个加速转型期,我国社会结构的最根本的变化就是由整合型社会向分化型社会的快速转变。而在此之前的140年间,中国社会结构尽管总的趋势是在由传统的农业型社会向现代的工业型社会方向变迁,社会结构的分化也在逐步发生,但整个社会结构却仍然处在分化程度较低、分化速度缓慢、具有较强同质性的状态。这种整合型的社会状态无疑在维护社会稳定上起过一定的作用,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分析所指出的,传统性社会和现代性社会实际上都是相对稳定型的社会,而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现代化却滋生着动乱。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整合型的社会在维护社会结构超稳定状态的同时,也导致了社会的停滞甚至倒退,而这无论如何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和社会转型要求的。

美国当代结构主义理论大师彼得·布劳的结构变迁理论认为:社会结构的组成实际上是指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表现出来的交往关系。按照这种定义,社会结构可以由一定的结构参数来加以定量描述,结构参数就是人们的属性。它分为两类:一是类别参数,如性别、宗教、种族、职业等,它是从水平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二是等级参数,如收入、财富、教育、权力等,它从垂直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这两类参数之间可以相互交叉,也可以相互合并,从而使社会结构的类型显得更加复杂多样。^[8]

而社会分化就是指社会结构系统不断分解成新的社会要素,各种社会关系分割重组最终形成新的结构及功能专门化的过程,与社会结构的构成相适应。社会分化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社会异质性增加,即群体的类别增多;二是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即社会群体间的差距拉大;而社会整合是针

对社会分化产生的异质性超越原有的规范而提出来的,是指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不同的构成要素、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提高整个人类社会一体化程度的过程。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与整合正是转型期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和根本动力。社会结构愈复杂,社会异质性程度愈高,社会分化与整合就愈频繁。社会转型实际上就是在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的循环往复中不断得以进步和发展的。所不同的是,在加速转型期,社会分化的烈度、速度、深度和广度比任何时期都要深刻,以致社会整合常常难以适应它的变化而使社会出现“断裂和失衡”现象,而这正是导致社会不稳定和社会问题大量涌现的根本性原因。

二、加速转型期中我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

社会分化是社会转型的基础,其一般表现为社会结构要素的增多、数量的扩大、社会结构形式的多样化以及功能的专一化。在加速转型期,我国政治、经济的改革极大地震撼和冲击了高度整合的传统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作为由各结构要素构成的一个静态概念,其结合往往是相对恒定、协调和均衡的,但在社会分化不断发生的加速转型期,由于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结构要素之间这种恒定的关系不复存在,分化与整合之间难免会出现失衡与失调现象,从而导致社会稳定难以持续维持、大量非稳定因素产生。^[9]具体来说,在加速转型期,我国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以下的分化。

1. 领域的分化 政治、经济和文化 3 大领域的分化是整个社会结构产生大分化的背景和前提。加速转型期以前,我国是一个低分化高整合度的社会,且这种“高整合度”主要是靠国家对社会采取强制性的、高度的政治整合来维持的,经济活动和精神文化也同样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因此,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形成了很强的同质性。在加速转型期,随着社会分化的加深、社会分工的细化,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逐步从政治领域中分化出来并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与此同时,政治领域本身也不再以全社会代表的身份,而以履行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的职责,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这样,经济、政治、文化 3 大领域由“大一统”向各自独立承担的功能分化,并为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分化打下了基础。

2. 区域分化 主要表现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采取的是由东向西的梯度开发战略,东部广大地区由于良好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经济社会一直处于领先的发展地位,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发展却相对缓慢。以东、中、西部农村地区人均纯收入为例,若以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为 1 作标准,1997 年东部、中部、西部的比例为 1:0.75:0.63,且这种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区域分化显得越来越剧烈。此外,根据有关部门对农村调查的数据推断,现在全国 80% 农村的农民收入水平普遍低于全国农村人

均纯收入水平,这也说明农民人均纯收入在不同地区的确差异很大。^[10]不同区域间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分化也是如此。^[11]

3. 阶层分化 加速转型期社会分化最为剧烈的莫过于社会阶层结构的巨大分化。长期以工人、农民、干部为主体的 3 大身份阶层在转型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以农民为例,先后分化出了农民工、农民个体工商者、农民私营企业主、农民知识分子、农民企业家、农村管理者等不同的地位群体,而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仅只占农民总数的 60% 左右。^[12]阶层内部的分化打破了长期以来刚性单一、相对封闭而又具有较强独立性的身份地位,使其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出现了诸如农民身份的工人和农民身份的干部、工人身份的农民和工人身份的干部、干部身份的工人和干部身份的农民等身份与职业相背离的边缘性群体。这种边缘群体的出现正是社会分化的直接结果,他们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将会使其缺乏稳定而长期的预期,在丧失原有的文化价值和组织归属地的同时,很可能会陷入一种“游民化”的状态,从而对整个社会稳定构成潜在的威胁。

4. 组织分化 进入加速转型期之后,社会组织结构也由一元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并形成了大量新型的经济组织和民间组织,其结构模式多样化,异质性十分明显。现实是党的基层组织削弱,而过去已经解体的传统社会群体,包括宗族、种姓、宗教等团体重新聚合,且在社会生活中地位不断上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地区帮会组织不断勃兴,流氓、娼妓、乞丐等次生社会集团重新滋生,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5. 利益分化 在加速转型期,伴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各类利益主体的自主权也在不断扩大,利益的分化也势必发生。社会分化产生的许多利益群体和阶层,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会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对利益的追求会成为人们社会行为的一种强大动力。而利益的分化实际上也是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过程,这必然会在不同利益主体间产生广泛的矛盾和冲突,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企业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不仅如此,利益分化还会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以城乡收入差距为例,1998 年城乡收入差距由上年的 2.46 倍扩大为 2.54 倍,比 1990 年的 2.2 倍扩大了 0.3 倍,又接近到 1978 年改革开放初期 2.6 倍的水平。^[13]

6. 观念分化 社会分化的加速也必然会在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有所反应。尤其是随着外来文化的传播和扩散,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将会不断趋于多元化,社会成员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自由度将大大增加,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也会大量涌现,致使各种观念相互碰撞与冲突。社会所倡导的价值标准与实际生活中人们所奉行的行为准则在许多方面相背离,使得某些人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公与私、义与利等重大问题上愈来愈向后者偏移,这已成为加速转型期某些人行为变异和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大量产生的思想基础。

社会结构的分化使整个社会成为具有许多层次的多元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又由许多处于不同地位、拥有不同权力以及担任一定职责的社会群体组成。毫无疑问,社会分化在促使社会结构功能更加完善、更加充满活力的同时,也使社会结构更加多样化、复杂化,从而给社会稳定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总的来说,社会分化对我国社会稳定可能有以下的影响。一是动摇传统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转型期以前,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个高度刚性且具有很强同质性的封闭型结构,这种封闭型结构具有顽强的超稳定性,而社会分化的不断产生势必打破社会结构的封闭局面,动摇社会的稳定性。二是引起社会群体的地位重新排序。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将会促使一部分处于新地位的社会群体对社会现有的制度结构和组织状况提出新的要求,^[14]这种要求若迟迟得不到满足便会形成群体间的利益冲突,从而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的威胁。三是分化瓦解原有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交换规则。在社会分化中,社会规范作为社会结构制度化的表现形式,也必然会程度不同地得到分化瓦解,且在实际分化过程中,其往往要慢于社会结构实体要素的转化,这样必然会出现新旧规范的冲突与脱节,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相对混乱和无序。四是分化的不均衡性导致新的结构性失衡和冲突。社会分化并不是与社会结构要素同步同时发生的,它们具有一定的异步性和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导导致新的结构性失衡和冲突,从而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障碍因素。

三、只有建立新型的社会整合机制才能确保社会的稳定

社会分化会引起社会非稳定性的扩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会导致社会结构的解体、社会秩序的动荡和社会问题的增加,因为社会分化的过程本身也可以孕育着新的交换模式的建立和新的整合方式的出现。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加速转型的实质是要摆脱不发达状态,以逐步实现现代化。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结构不断优化过程,也是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和重新整合并逐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并冲破已成定势但往往僵化、停滞的社会结构,以促使新的社会结构要素不断生成。这就需要对已经分化了的社会结构不断进行新的社会整合。

然而,加速转型期以前,国家对社会采取强制性的、高度的政治整合在牺牲社会的活力和自主能力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并没有获得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同步效应。进入加速转型期后,我国社会呈现出了高分化低整合的特点,在社会分化快速发生的同时,社会整合表现出了明显的滞后和弱化,主要体现在下述方面。

一是社会分化和社会变动的加速使得传统的社会整合力量不断弱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伦理型社会,伦理道德、社会舆论、民俗民风一直具有很强的社会整合力,能在很大程度上约束和

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但这种整合力的发挥是以家庭、家族、社区为实现单位的,且是一般建立在高度同质性的社会环境中。在加速转型期,因社会分化促进了社会异质性的增加而使传统社会整合力的发挥丧失了社会基础,所以传统整合单位的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弱化或发生变动。这无疑从整体上削弱了社会整合的力度,动摇了一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致使社会中大量违德违法行为急剧增长。

二是新的整合机制尚未建立之前,国家强有力的政治整合能力却在不断下降。加速转型期以前,国家通过组织结构对社会成员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大规模社会动员、行政领导的方式,实现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整合。这种整合是建立在集权体制、计划经济和一元化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是以实现政治整合为中心任务的,^[15]因此,整个社会成员思想统一、行动一致、社会稳定。但进入加速转型期以后,尤其是确立市场经济机制以来,传统的组织管理系统开始松弛化,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明显下降,致使社会整合的社会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使以旧的政治整合型为中心的社会整合机制也开始松弛,整个社会整合的作用和能力不断下降。以农村为例,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以后,新的农村行政组织并未起到强有力的社会整合作用,致使农村社区无序行为大量增加。因此,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在新的社会整合机制尚未形成之前,在全社会不断培育各种有影响力的社会稳定组织的同时,继续赋予政府以相当的权威,对于正处于加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三是由于新的整合机制一时难以形成并完全运作,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交接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空白环节。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快,传统的、旧的社会整合力量在不断弱化,而新的整合机制又一时难以形成,这种社会结构分化与整合的异步性必然会造成交接过程中的“空白环节”,从而导致大量社会失范现象的出现。如前面提及的农民内部分化中产生的农民身份的工人,其既不为农村社会所整合,又不为城市社会所整合,他们只能以“边缘群体”的身份在城乡社会的夹缝中生存,势必会产生一种不被社会所接受的不满情绪,其一旦生活无着落,便会采取一种反社会的行为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其实,当前我国大量非稳定因素的潜伏和涌现,无不与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不适应、相脱节有关,这也正是威胁我国整个社会稳定的结构性、制度性根源所在。

无论是从维护社会稳定还是保持社会的持续发展来看,社会结构的快速分化对社会整合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建立新型的适应社会分化要求的社会整合模式已成为当务之急。然而,社会整合的类型和模式有许多种,如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 Durkheim)曾把传统社会里一种外在强力的整合称为机械整合,而把转型社会中在功能分化基础上功能互补的整合称之为有机整合。社会学家洛克伍德(D. Lockwood)也曾提出过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的观点,企图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上来对社会分化进行有效整合,后经哈贝马斯(J. Habermas)、吉登

斯 (A. Giddens) 等人的发展在社会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分化中的整合方式,一般来说有两种,即自然整合和强制整合。自然整合一般是建立在地缘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是人类社会初期最主要的整合方式,因此又称作先赋性整合。而强制整合是由占优势地位的一方,通过建立规则控制其它的参与者而形成新的交换模式的过程。无论是自然整合还是强制整合,其实质都是社会制度化的过程。只有通过这一制度化的过程,产生的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才能不断得以“再生产”并承传下去,成为制度创新的一部分。此外,根据社会整合的内容和使用的手段,又可以把社会整合分为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制度性整合是指运用国家的各种政策、法规和法律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条理化和合法化梳理,使其纳入统一管理和控制轨道的整合,其具有强制性和契约性特征。功能性整合是从统一社会劳动的角度出发,对伴随社会分化分工出现的职业异质性而进行的整合,它是在市场引导下的自发过程。认同性整合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的思想性整合,目的是让人们在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达到认识上的趋同。可见,这3种整合在转型社会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独立存在,并分别从社会的制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3个方面对社会结构分化进行全面整合。^[16]当前,中国社会整合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强化功能性整合的同时,不放松制度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的建构,以避免社会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所产生的周期性振荡和结构性障碍。

总之,转型社会的分化与整合是一项伴随着挑战与机遇、失范与重组的非常复杂的社会工程。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快速分化的条件下,无论采取哪一种类型和方式的社会整合,要想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要求下,适应加速转型中社会分化的需要,就必须建立起具有系统化、组织化和民主化的新型社会整合机制,即建立起一种以建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关系为目标,以民主政治为其制度保障,以社会群体组织化为其社会基础,以现代价值导向系统为其精神动力的多元化的有机整合系统。^[17]只有这样,才能在加速转型期,一方面积极引导、控制好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使之达到合理有序、相互衔接、良性循环的状态;另一方面促进社

会结构的不断完善,以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与注释

- [1]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册.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年版, 544
- [2] David Harrison: The sociology of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Academic Division of Unwin Hyman Ltd. 1988, 56
- [3] 蔡明哲著. 社会发展理论——人性与乡村发展取向. 台北: 台湾巨流图书公司, 1987. 66, 189
- [4] 陆学艺, 景天魁主编.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23
- [5] 笔者认为, 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转型, 一切社会形态的飞跃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转型, 如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实际上都是一种社会转型, 都有一个转型期。但本文对社会转型的理解和分析主要从狭义的角度进行。
- [6] 鲍宗豪主编. 当代社会发展导论.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360
- [7] 有关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详细论述请参见郑杭生教授的论文《中国社会大转型》(《中国软科学》1994年第1期)及著作《转型中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的前言部分, 把1978年后的中国社会称为“加速转型期”正是由郑杭生教授提出来的。
- [8] 彼特·布劳. 不平等和异质性.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 [9] 程超泽.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非稳定性. 东京: 中国研究, 1998年春季号, 9
- [10] 汝信, 陆学艺, 单天伦主编. 200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版, 374
- [11] 文军. 市场经济下我国城市面临的社会问题. 城市问题, 1995(3)
- [12] 赵长保等. 对农民职业分化的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 1994(3)
- [13] 汝信, 陆学艺, 单天伦主编. 199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版, 360-361
- [14] 张雷, 程林胜等著. 转型与稳定.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242
- [15] 阎志刚. 社会转型与转型中的社会问题. 广东社会科学, 1996(4)
- [16] 黄玉捷. 社区整合: 社会整合的重要方面. 河南社会科学, 1997(4)
- [17] 庞玉珍. 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新型整合机制的建构. 社会科学战线, 1999(3) (责任编辑 肖庆山)

(上接第47页)

绿色化学的思想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及具体体现, 化学家在这些方面已经并将继续作出更大的贡献。绿色化学的诞生, 体现出技术本身就具有生态价值, 为人类协调自己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物质手段, 为人类解决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提供了前提与保证。人类活动导致的生态退化、环境污染, 依靠有“原子经济性”(指在通过化学转化获取新物质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原料的每个原子, 最大程度地利用资源)等新概念的绿色化学技术, 有望使人类与自然界在高层次上和谐共处。

参考文献

- [1] 薛慰灵. 绿色化学——对环境更友善的化学. 化学教育, 1997(9)
- [2] 参见: Education in Chemistry, 1998, 35(6) 封二
- [3] 闵恩泽, 傅军. 绿色化学的进展. 化学通报, 1999(1)
- [4] 朱清时. 绿色化学的进展. 大学化学, 1997(6)
- [5] 吴泳. 绿色化学——化学教育的新课题. 化学教育, 1998(8)
- [6] 钱贵晴. 微型化学实验与 M. L. 仪器的研制. 化学通报, 1999(1)
- [7] 曾庭英, 宋心琦. 化学家应是“环境”的朋友. 大学化学, 1995(6)
- [8] 张玉来. 发展绿色化学. 人民日报, 1998-7-14 (责任编辑 孙立明)